

抗大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内在一致性

高慧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诞生90周年。1936年6月,抗大诞生于瓦窑堡,原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进入延安后使用抗大之名,其后一度到敌后办学,后期仍回到延安。抗大常被称为“延安抗大”,是延安时期最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培养机关。办校九年间,抗大共培养了十余名军政干部,为抗战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干部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熔铸了光辉灿烂的抗大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抗大精神与延安精神都孕育诞生于延安,二者在内涵上有着密切和深厚的关联。抗大精神与延安精神培育产生的环境、背景和条件相同,其内涵有很多共同之处,其精神特征也有着广泛的同构特征。抗大精神的三项主要内涵与延安精神完全一致,而且相融相生、相辅相成,有着紧密的内在一致性。

一、抗大精神产生的时代条件与延安精神同源同质同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个教育方针加上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抗大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抗大精神不仅为抗战培养大批所需人才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还为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毫无疑问,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共同培育形成的党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不仅产生来源同源,本质内涵同质,而且构成形式同构。

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都是延安时期老一代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共同培育形成的精神产物。延安时期,延安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和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抗大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壮大,抗大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孕育、繁盛,延安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培育形成,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都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耕耘的成果,都打上了延安的烙印。因此可以说,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出于同源。

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延安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的主干之一,抗大精神则是枝干。延安精神中包含了抗大精神的内涵,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都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总体上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因此可以说,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一致的,也是同质的。

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精神成果。因此,二者的内在构成也是同构的。延安精神和抗大精神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实践中共同培育形成的代表了、引领了时代精神的精神风范,二者的形成机制是相同的,即抗大精神与延安精神在形成机制上是同构的。

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

如果把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二者的核心内涵有着很强的一致性。抗大精神的第一内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恰恰也是延安精神的第一条。这一内涵的核心要义是坚定和正确。延安时期面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抗日主张,坚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胜,坚持不懈实行抗日持久战。历史证明了中国革命历史抉择的正确性,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执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挽救了中国。其中体现的精神内涵,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被视为延安精神和抗大精神的第一要义。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延安时期具有广泛的传播度和深刻的影响力,不仅对于抗大精神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时对于延安精神的培育形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显性标志。这条方针精准击中抗大学生的教育和成长痛点,对培养抗大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成为抗大学生精神风貌的显著标志,而且成为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整体精神风貌的显著标志,因而也成为后来提炼延安精神的首选核心概念。

全面梳理延安精神与抗大精神的内涵可以发现: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既是抗大精

神的核心内涵,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二者一体两面,相辅相生,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创造。

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延安精神的实践特征

抗大精神的第二内涵: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恰恰也与延安精神的另一核心内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一致。抗大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师生上山挖窑洞为校舍,是著名的“窑洞大学”。“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地面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顺口溜,既反映了抗大师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反映了抗大教学条件的极端艰苦。在当时条件下如果没有这种不怕艰难困苦、迎着困难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就很难应对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在当时,如果不能自救就只有饿死或者解散这两种后果,这就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严峻局面。唯有自己动手,是唯一出路。

延安时期,整个延安和边区都极端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全面展开,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围困,打破了边区的困局,把一穷二白的贫穷边区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示范区。在此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也孕育成为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标志之一。因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是顺理成章的必然逻辑。

从抗大精神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到延安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二者的培育形成过程是同频共振的,二者的内涵也是一脉相承的。抗大精神要求把艰苦奋斗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蔚为风气,到延安精神中,则突出自力更生,从创业立业的角度,倡导这样一种精神,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都需要这种创业精神,从而培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总体精神风貌,持之恒久,因而将无往而不利。

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延安精神的活的灵魂

抗大精神中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虽然没有与延安精神直接对应的提法,但实际上仍与延安精神密切相关。延安精神中的第二项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与抗大精神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相吻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机械、不教条,不主观、不盲目,实事求是,灵活机动,这就就需要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为处事原则。而延安精神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于抗大,特别是用于军事教育,则体现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而延安精神中的“解放思想”,则针对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才能破除教条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由于大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风,抗大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成为抗大师生的自觉意识与行动,党内外实事求是之风日益蔚成风气,也就逐渐形成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内涵。因此,实际上从抗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提出,到形成延安精神核心内涵之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在延安广泛传播与认同、贯彻的过程。

抗大面对的问题,就是延安和边区总体面对的问题,毛泽东为抗大倡导的应对之策,就是延安时期边区的应对之策,毛泽东针对抗大提倡的精神导向,就是延安时期的整体精神导向。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的构成方式,都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路,针对抗大和延安实践提出的应对之策和精神导向,经抗大师生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领会、实践和发扬光大,形成了整个边区和根据地共产党人的总体精神风貌。因此,抗大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同源、同质、同构和一脉相承的精神现象。在形成轨迹上,很清晰地显示出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先导和源头,延安精神是在抗大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和升华形成的。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作为党的精神谱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我们应当不断发扬抗大精神和延安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以小案践初心 以实干显政绩

张子萱

正确的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前行指引,更是司法工作的价值标尺。对于基层刑事审判工作而言,政绩从不是空洞的口号、冰冷的案件办结数量,而是藏在每一份细致审查的卷宗里、每一次耐心释法的沟通中以及每一次被实质化解的纠纷中。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始终把“为民”作为核心导向,把“实干”作为根本路径,把“实效”作为衡量标准,才能在基层刑事审判岗位上扎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司法温度。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守为民初心,从“机械办案”向“为民办案”转变,找准岗位履职的出发点。基层刑事案件面对的大多是普通群众,轻微及普通刑事犯罪,在办案过程中,不仅要严守法律与程序,更要读懂群众的诉求,摒弃“案结了事”的粗放思维,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主动回应群众需求,解决实际困难,让司法工作充满民生温度。在审理一起帮信罪案件时,一名从云南远赴山东受审的被告人,因家庭经济窘迫,一时糊涂出借银行卡触犯法律,到案后深刻认罪悔罪;其因跨省应诉食宿开销大,家庭负担重,迫切希望尽快结案返乡。承办法官团队了解实情后,秉持司法为民理念,在严格规范办案,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优化审理流程、加快办案节奏,依法高效完成案件审理,让被告人早日返乡、减轻家庭压力。事后,被告人专程寄来感谢信,既表达对法院高效办案的感谢,也郑重承诺今后严守法律底线。这次办案经历深刻说明,基层司法的政绩,从来不在卷宗里,而在群众心里。始终站在群众立场思考问题、办理案件,用暖心举措服务群众,才是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践行。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焦实质解纷,从“就案办案”向“源头化解”转变,把修复社会关系作为办案核心目标。立足基层刑事审判实际,直面常见多发的轻罪案件与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不简单以定罪量刑办结案件为终点,主动融入社会治理,积极开展释法明理、矛盾调处与追赃挽损工作。既要公正裁判的执行者,更要社会关系的修复者,透过案件表象抓住矛盾本质,用心用情化解心结、修复关系,努力让每一件案件都实现法理情相统一,以案结事了人和筑牢基层平安稳定防线,真正把司法政绩体现在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上。一起历时数年的邻里故意毁坏财物案,双方存在亲属关系,却因房屋相邻排水问题积怨多年,最终矛盾升级触犯刑法。承办法官没有简单一判了之,而是紧盯多年未化解的根源矛盾,多次组织庭前调解、庭中协商,耐心开展释法说理,兼顾法律规定与乡土情理,量身定制赔偿调解与邻里、家庭等矛盾纠纷,最终双方达成调解,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彻底化解了多年的邻里心结。这深刻体现出,基层司法的政绩,不在于办结多少案件,而在于化解多少矛盾、修复多少关系。要跳出机械裁判的思维定式,聚焦矛盾源头实质化解,才能以司法之力维护基层和谐稳定,让司法政绩真正契合基层治理的需求。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注重教化引领,从“依法裁判”向“治理与治理并重”转变,把法治引领作为价值追求。司法审判不仅是明辨是非、惩治犯罪的过程,更是普法教化、引领风尚的过程。尤其面对涉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等案件,更要摒弃“重惩罚、轻教育”“重裁判、轻引导”的片面理念。始终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既以公正裁判捍卫法律尊严,又以法治教化涵养文明风尚,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人、警示一方、治理一方”的长远效果,让司法政绩兼具当下实效与长远价值。在审理一起5名未成年人“拉车门”盗窃案时,因涉案人员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民事赔偿一度陷入僵局。承办法官没有简单判决结案,而是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柔性调解,最终促成监护人全额赔付受害人主损失;同时现场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法治教育,依法向监护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履行监护责任,用司法温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此同时,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始终将未成年人法治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聚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校园霸凌等重点内容,组织法官及助理深入校园、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全方位普及法律知识,培育法治意识,推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正确的司法政绩,既要立足当下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更要着眼长远强化源头治理、传递法治理念,以司法担当助力社会治理,彰显新时代司法为民的初心使命。小案虽微,系关民心;实干无声,彰显政绩。新时代基层刑事审判工作,始终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方向,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次细致审查、每一场耐心沟通、每一次实质化解的司法实践中。要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深耕刑事审判主责主业,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案”,全力以赴化解基层各类矛盾纠纷,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用公正司法与温情服务,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使命的履职答卷,让正确政绩观在基层刑事审判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及时代价值

秦宁波

燕赵大地自古以“慷慨悲歌”著称,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从革命先驱李大钊到狼牙山五壮士,从投笔从戎的杨裕民到回民支队的民族英雄马本斋,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英烈的近亲属作为最直接的见证者和聆听者,他们的口述史料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桥梁。新时代加强对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燕赵英烈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加强对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要坚持抢救性与科学性并重。挖掘过程中,需要深入英烈家乡,通过访谈、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下近亲属们对英烈生平事迹、牺牲经过、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回忆。同时,要充分认清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挖掘仍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部分英烈近亲属年事已高,记忆逐渐模糊;口述史料的整理与分析工作量大、难度高等。应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对高龄近亲属的访谈进行高

清影音全记录。不仅是记录他们说了什么,更要记录他们的表情、手势和眼神,这些非语言信息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

加强对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需秉持“去伪存真”原则,将“证伪”与“证实”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口述史料多以家族记忆形式散存于民间,通过代际口耳相传,难免存在时间错位或情感渲染现象。部分近亲属在追忆时可能混淆事件细节,或因崇敬心理不自觉美化先辈事迹。因此,史料工作者需以党史正本为参照坐标,通过交叉比对文献档案、实地走访、多方印证等方式,对每份口述内容进行严谨考证,确保最终留存的史料既保留历史温度,又具备学术信度,真正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信史。

加强对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亟需构建“燕赵英烈口述档案数据库”。通过数字化手段打破地域壁垒,将散落在全省各城市的家族记忆汇聚成完整的历史拼图。数据库建设应遵循“应收尽

收”原则,对现存英烈近亲属进行全面摸排登记,采用高清录音录像设备记录口述内容,同步采集老照片、家书等实物史料。针对部分燕赵英烈后代缺乏讲述经验的问题,需组织专业团队开展访谈培训,指导其掌握叙事逻辑与历史细节,变“被动接受采访”为“主动讲述传承”。通过建立标准化录入规范和智能检索系统,最终形成可共享、可追溯的数字化记忆库。

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一项兼具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的系统工程,需以敬畏之心挖掘其深层内涵,让这份流动的记忆焕发持久生命力。一是有助于推动历史传承,还原真实。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犹如一部部生动的“活历史”,为史书记载提供了丰富补充。近亲属作为英烈生活的见证者,他们口中的细节,能让历史场景更加鲜活地重现。这些口述史料填补了历史空白,让我们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到那个时代的风貌,让历史传承更加完整、真实。二是有助于弘扬燕赵英烈

精神,凝聚奋斗力量。近亲属口述史料以情感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当人们聆听英烈后代讲述先辈的英勇事迹时,能真切感受到英烈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无私奉献、英勇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能激发人们内心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让燕赵英烈精神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产生强烈共鸣,凝聚起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三是有助于推动学术创新,为学术研究提供新视角。燕赵英烈近亲属口述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丰富的素材,它打破了传统文献研究的局限,使研究者能够从亲历者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理解历史人物。通过对口述史料的整理和分析,可以挖掘出更多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信息,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等学科的创新,让学术研究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3CDJ039))

课程思政融入生涯规划教育的路径探索

韩红梅

目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升级速度加快,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变得复杂和多元,促使青年群体亟须提高职业认知和责任感。时代需要具备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结合职业发展指导方式成为改进的方向,该做法能够推动技能传授和价值引导同时进行,协助青年群体找到个人成长道路,进而主动对接国家整体发展大环境。

一、课程思政赋能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在逻辑

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融入职业发展指导模式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激发青年群体不断探索的内在动力,使个人价值要求和社会整体发展需要达到深度结合。职业指导不仅是对工具性技能进行传授,而且是确定人生方向和职业伦理的重要内容,它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导向作用。将思政内容当作精神内核加入到来生涯规划模式中,可以从思想源头上消除专业知识和道德素养之间存在的隔阂,形成一个共同培育人才的整体平台,该逻辑让教育过程不再局限于单纯就业驱动,而是转而关注学生整个职业发展过程,使学生在面对复杂多

样的择业环境时能够拥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推动职业潜力的发挥。

二、课程思政融入生涯规划教育的实践策略

(一)整合动态教学内容,筑牢职业价值基石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准确对接区域经济发展脉络和专业群建设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模块化并且持续更新的内容模式,使理论传授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教育者应当从海量行业资讯里筛选出带有时代特点的思想引领材料,并且将它们按照职业认知和目标设定部分进行分类,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群体的认知规律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低年级学生主要关注宏观环境分析、工匠精神培养,高年级学生则着重加强职场伦理规范的学习。非物化文化遗产类专业集思广益进行教学时,将传统纺织印染工艺技艺传承人的真实成长经历当作教学内容,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教师分析手工艺人在坚持传统技艺和适应现代商业环境之间做出的价值选择,引导青年学生在学习如何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现代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主动将文化传承的责任变成实际行动,并让专业技能的运用和民族文化自信保持一致。

(二)构建情境驱动模式,强化职场责任担当

为打破传统单向理论讲授的限制,应借助产教融合形式来形成沉浸式实训空间,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职业行为习惯。教育主体和行业标杆企业共同进行实战型演练项目的开发,将真实的岗位任务和职业道德考验同步融入到现场场景中,组织跨学科团队进行市场调研、方案策划,引导参与者在解决团队分歧和技术难题的过程中体会精益求精和诚实守信的职场操守。企业导师参与课堂指导能够建立起以真实工作流程为基础的互动研讨平台,学生处于高仿真的职业情境里,可以检验自身专业基础的扎实程度,并能够直接感受到企业文化对个体责任意识的规范作用,进而主动纠正偏差的择业观念,为进入真实职场积累同时具备专业硬实力和思想软素养的复合竞争优势。

(三)完善多维追踪评价,巩固协同育人成效

价值引领的成效,高校需要改变过去只关注一个方面的最终评估,转而进行全过程和多个角度的综合评价模式建设。在确定评价指标时,应把家国情怀和职业操守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可以观测到的行为节点,并按比例计入总评成绩,还应扩大评价主体的覆盖面来提高考核公信力,结合专任教师、辅导员、校外实习指导专家和同辈群体的力量,建立全方位交叉验证的反馈网络。本文形成包括学生整个学习阶段的成长档案,整体记录学生参加志愿服务和实际操作演练的真实情况及思想变化过程。通过动态收集数据资源库,教育团队能够发现学生在职业认知方面存在的不足,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化辅导干预,确保正确的导向始终存在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中。

将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职业发展指导领域结合起来,能够满足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通过改变内容资源结构,更新情境体验模式并形成立体化评估模式,能够减少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之间的断层,推动高校在协同育人方式改革上,重点培养拥有扎实专业本领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复合型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作者单位:莱芜职业技术学院)